

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

——兼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作用

张素芳

摘要：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必须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为指南。经济学者应当增强献身科学的事业心、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坚持不懈地潜心研究，才能取得更大的理论成果。

关键词：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历史唯物主义 劳动价值理论

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革的转型时期。这是一个变革社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从而必然引起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基础进而促使社会上层建筑都相应变革的伟大时代。这一时代，同时就是思想大解放、学术大发展、理论大创新的时代。在我国的社会科学中，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探寻我国转型期人们之间的社会物质经济利益关系，揭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客观规律，对于指导变革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文试图结合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状，谈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作用和笔者对转型期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粗浅意见。

一、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

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缘于它要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必须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和科学指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

第一，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的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它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样，以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揭示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和社会经济的运动规律。

人类社会，既是一个受制于客观自然界同时又是表现为人的主观能动性起主导作用的复杂机体。自然界表现为客观存在，而在社会领域，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整个社会表现为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政治交互作用的复合体。人们为了认识和利用自然以谋取福利，产生了专门研究自然界各种物质和现象的客

观内在联系和变化规律的自然科学，诸如物理学、化学、数学等。人们为了认识社会，产生了专门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客观内在联系和发展变化规律的社会科学，诸如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任务，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通过发现现实的联系来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任务是揭示人们之间社会物质利益关系的客观内在联系和社会经济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指出，人都是有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政治经济学就是要从社会现实的、具体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客观联系中，揭示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正因为此，“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问世，始于人类社会的物质产品普遍表现为商品和货币的时期。

物质产品表现为商品和货币，本来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使人们之间原本直接、简单、明了的关系，披上了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和货币，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

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进而把人们在分工生产基础上通过产品作为商品交换以实现经济利益的社会关系反映成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机体蒙上了神秘、虚幻的纱幕。人们不能控制商品交换这一运动而是受其控制,使其通过商品交换而互相交换劳动以实现经济利益这一社会关系变得更为隐秘,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变得更为错综复杂。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其自然必然性确立了统治地位,经济活动的社会联系更为广泛,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更为复杂,专门研究社会经济生活的内在联系和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揭示对其起支配作用的客观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也就应运而生。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研究的是由商品这种物所联结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

17世纪中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透过商品交换的现象,发现了商品的价值的源泉是劳动,提出了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并试图说明劳动创造价值与工资、利润、地租、利息之间的关系。由于时代和个人本身的局限,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中虽有科学的成分,但许多认识是矛盾和混乱的,未能完成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内在联系的任务。19世纪中叶,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创立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巨著《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马克思从对商品的一般社会经济关系中揭示出内在于其中的价值规律,分析了价值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生及其在矛盾运动中发展变化的客观必然性,说明了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创立起完整、严密、科学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社会现实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及其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的客观内在联系的科学。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进行了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革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将一直持续到市场经济体制完全建立、健全和完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是经济主体由行政机构向直接经济当事人的换位,是经济权益由行政机构掌控转变为经济当事人通过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直接去获取,是经济运行从由行政命令到由客观规律自发调节的根本转变。这是社会的经济关系、权益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必须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才能探明这一变革。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传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现实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研究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各自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调节方式,探明改革进程中这两种经济体制发生作用的机理及

其与人们现实经济关系和社会经济运行的内在联系,揭示出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和社会经济的运行规律,由此建立起理论体系。只有这样,它才具有科学性,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所以,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转型时期的继承和发展。

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有别于西方经济学,也不是部门经济学或产业经济学等应用经济学,更不是为政府提出或阐释改革与发展的决策、政策、对策的政策经济学,而是一门独立的以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关系为研究客体的社会科学。

第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是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基础之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把事物的发展变化看作事物本身固有的属性,从事物本身的联系来把握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从事物本身的客观内在联系中揭示其发展变化规律。这是正确认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及其规律的基本方法,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考察人类社会,发现物质生活是其他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因此“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揭示了社会现象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就是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考察人类历史而创立的唯物史观,为人们认识社会生活的内在联系和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秉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社会存在即客观的物质生产方式出发探寻从计划经济体制变革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如何改革以建立起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全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而不是从政治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框架内去寻找改革的理论依据;相反,应当以计划经济体制变革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全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为基础,进而研究现存的政治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的相应改革。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在考察社会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

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这正是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秉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必须把握的基本原则。

第三,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运用的抽象法,是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采用的科学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只有运用科学的抽象法,才能从社会特定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现象形态中,揭示其本质联系和发展变化规律。科学研究必须在充分占有特定社会的生产和产品交换的丰富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抽象法,对这些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进而从最简单、最一般、最本质的关系到更为复杂、更为特殊和更为具体的关系,即从抽象到具体,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部联系。因为最一般的抽象总是从最丰富的具体中产生,并为这些丰富的具体所共有,所以,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就是从对最一般、最本质的关系的认识到探寻它与其他特殊的、具体的以及总体的关系来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发展变化规律。这是唯物辩证法在认识论中的具体体现和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采用马克思的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透过现实社会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以及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表象,探寻人们之间内在的真实联系及其物质利益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特别是当前,改革处于攻坚阶段,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经济形式处于交织、胶着状态,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表现为多元分化的趋势,引发了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和激化。要科学地认识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和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必须采用科学抽象法,才能拨开种种现象的迷雾,从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在联系中揭示其本质,提出科学的理论认识。所以,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是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二、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写下了科学巨著《资本论》,创立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三卷《资本论》,开篇研究的是商品的一般属性,揭示了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及其所体现的社会经济关系;接着研究资本关系,揭示了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不但没有违反价值规律,而且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到相对剩余价值生

产的变革;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流通以及再生产,都受价值规律的客观制约而运行;利润平均化,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不是与价值规律发生矛盾,而是商品经济愈益社会化,价值规律进一步在社会范围内分配利益和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这样,就揭示了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小私有占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制,是通过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本身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发展而客观地产生的,说明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为社会主义取代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我们首先必须读懂马克思的原著,透彻理解其理论原理及其逻辑体系;然后根据一百多年来各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以社会实践来扬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其科学理论来指导转型期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在于它揭示了商品经济社会内在的、客观的价值规律及其支配特殊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产生、发展、变化的自然必然性。马克思从纷繁复杂的商品交换关系中探寻到: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之所以能够互相交换,在于它们同一的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都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力的单纯凝结,商品“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①商品的价值量即商品相交换的量的比例,决定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②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即为价格,价格只能在商品的市场交换中由买卖双方平等协议形成,因而表现为市场价格;以货币表现的商品的市场价格,成为商品价值的独立表现形式,同时也是对商品所有者利益分配的媒介和实现形式。商品的等价交换,实质就是各个分工生产的商品所有者按其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互相交换劳动,以货币为媒介实现公平分配以获得满足自己消费需要的多种产品,制约和激励着商品生产者有效配置资源,使分工生产的个人和社会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商品的价值规律,体现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通过价值这一迂回曲折的形式互相交换劳动以实现物质利益的社会经济关系,建立起个别生产与社会生产之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客观内在联系,成为支配商品经济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客观规律。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自然规律,也是我国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的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我国正常商品交换中价值规律必然作为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必须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作为研究我国转型期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这门学科的任务正是在于像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样,阐明价值规律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中是如何客观

地支配人们进行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剩余价值的占有、分配、再分配已经发生了与《资本论》时代不同的新变化。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需要我们研究发展变化了的新情况,修正和创新剩余价值理论。其一,明确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扩大的、发达的商品生产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分工和人类发展进步的必经阶段。只有通过由价值规律所支配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⑩,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必然性和历史的进步意义。其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关系的新变化。我们应当正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关系与马克思时代相比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是劳动者的个人权益具有更加完善有力的市场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保障,劳动条件随着科技进步而改善,工资收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增长,生活水平随着社会进步而提高,资本与劳动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本来就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不断协调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条件。二是公共财政的职能对剩余价值再分配使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更多地惠及普通劳动者,缩小了市场初次分配的差距而更趋于公平。三是中产阶级日益扩大改变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规律的论断,半个多世纪以来已无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迹象。四是福利国家表现出的福利的社会化和均等化所显示的社会主义因素,是否趋向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这些,是我们科学地对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必须研究的新情况、新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创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对于研究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剩余价值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得出其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趋势。但是,前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后又出现了倒退,我国也放弃了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正在探寻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对此,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所创造的物质基础之上,社会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⑪然而,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都建立在资本主义尚未发展的历史阶段,国家政权并未停止对社会关系的干预,显然当代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设想不是同一发展阶段;马克思是人,不是神,他不可能在一百多年前就规定出未来社会的具体模式。因此,社会主义的实现和现实就不能超越历史照搬马克思的个别论断,而只能遵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去探寻和

演进。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没有完全搞清楚。”^⑫过去把从对马克思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当作社会主义的模式,不顾实际情况运用行政权力从上而下来推行。我们应当反思,对此马克思会不会说:“我只知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⑬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最根本的在于它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之上,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揭示出其客观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社会科学包括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⑭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最基本和最根本的是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客观内在联系及其运动规律的方法和原理为指南,来研究现实社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自然历史形式,而不是把它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⑮当今,在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谁肯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认真地研究我国转型期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

三、转型期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期间,经济学者特别是老一辈经济学家,追求真理,勇于探索,勤于思考,率先冲破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束缚,基于对计划经济体制弊病以及商品经济关系和价值规律的正确认识,提出了一系列从计划经济体制变革为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观点,为推动改革走上市场化道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经济学已经成为显学。但是,自90年代初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许多研究者纷纷抛开社会经济关系和客观经济规律去研究经济运行,为政府决策服务的政策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迅速走红,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反倒很不发展,其研究显得薄弱和滞后。现阶段由于经济体制处于变革

时期,不成熟的社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不可能产生系统、成熟的中国转型期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从不同的方面以专题去研究现实社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中人们之间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却是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笔者认为,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存在着以社会的意识形态去推论而不是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客观实际中去研究现实社会经济关系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应当从对我国现实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客观实际的研究中提出理性认识,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中,去探寻计划经济体制变革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自然必然性以及如何改革。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⑩应当“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方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⑪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对这方面的研究非常欠缺,很不深入。一些研究者往往脱离社会实际去推论某种既定的概念,从既定观念和意识形态出发去设计和限制改革实践。有人把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用政策和意识形态来阐释,归结为个人主观意志抉择和行政权力作用使然。有人不是从我国社会现实生产力水平出发研究与其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要么从经典著作中找根据,要么以抽象的教条或无视前提的结论为框框,要么不顾转型期的现状和特点照搬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理论。有人忽视经济规律的客观调节作用,不去研究和阐明支配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价值规律如何发挥调节作用来提出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见解,而是一味强调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掌控;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还不断强调要尊重价值规律,可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价值规律的客观调节作用反倒少有人研究和提及。这些,使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很不突出,难以形成揭示我国现实社会经济关系的客观内在联系和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理论,政策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覆盖甚至取代了政治经济学。

第二,表现出孤立地描述社会经济现象而不是透过经济现象去探寻社会经济关系的真实内在联系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

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经济社会,是由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环节组成的有机整体。在特定的条件下,生产创造出适合需要的物质产品,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这些产品进行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后,产品进入消费。“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

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⑫研究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及其内在联系,揭示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和经济运行规律,是转型期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使命。可是,这一研究往往被形而上学化。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被割裂为彼此没有联系的孤立活动,不是从社会现实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去研究社会经济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而是以个人感想肤浅地、孤立地、就事论事地谈论经济生活中的现象和问题。比如,我国社会出现的官员腐败、国有资产流失、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改革不是以切实确立市场主体自主、平等的经济地位并以建立健全市场运行机制为基本着力点来推进,而是倾向于强化行政权力对社会资源和收入分配的掌控以及对经济活动的直接介入和管制;政府自身改革滞后,经济活动实际上仍然隶属和受制于行政权力;只把劳动产品从形式上变为商品,生产要素并未真正市场化;改革对象错位,不应市场化的反倒率先“市场化”;导致了行政权力强化、地方政府行为失范,扭曲了市场化改革,破坏了市场初次公平分配经济利益以及制约和激励有效配置资源的客观机制发挥调节作用,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有人只看表象不究实质,简单地将这些社会问题归咎于市场化改革方向,这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⑬正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使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未能结出硕大的科学理论成果。

第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缺失因而难以科学地深入研究转型期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规律。

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人类先进思想的传承和创新,都是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本学科已被证明了的基础理论分析研究现实问题,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劳动价值理论,是指导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基础理论。可是,一些政治经济学论著,表现出不具备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常识和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功底,不通学理,缺乏理论逻辑和学术规范。比如,对市场经济的社会关系缺乏基本认识,把市场经济仅仅看作是资源配置的手段,认为从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市场经济体制只是改变资源配置方式,而又不知道市场配置资源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关系和市场运行机制即价值规律发挥客观调节作用的基础之上。不少人不认识由价值规律制约的商品交换是市场初次分配的实现形式,具有客观公平性,并且是制约和激励资源有效配置的手段和实现形式;不明白市场经济的公平分配和有效配置资源都统一于客观的价值规律调节,内在于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之中;不了解市场化改革是社会经济关系和权益关系以及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面革新;不懂得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不是在真正弄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去研究我国应当如何推进市场化改革,以(下转第32页)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文版,6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中文版,3、5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当然,这里的信息不完全,主要是作为买方的购房者的信息不完全。开发商实际上信息是完全的或者至少比购房者充分,因此,开发商与购房者信息是不对称的,结果导致了购房者利益受到侵害,也引起了围绕车库和会所的矛盾和纠纷。

也就是阿尔钦(Alchian,1965)、波斯纳(Bosner,1986)、巴泽尔(1997)所说的商品所有权的分割。

实际上乙可能先买 q_1 和 q_2 中的任何一个,本文为了便于分析假定他先买 q_1 。

参考文献:

1. Alchian, Armen A., 1965. "Som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 *Politeico*, 30, No. 4, pp. 816-829.
2. Gordon, H. Scot, 1954. "The Economics of a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The Fishe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2, No. 2, pp. 124-142.
3. Knight, Frank H., 1924. "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s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38, No. 7, pp. 582-606.
4. Posner, Richard A., 1986.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3rd ed., Boston: Little, Brown.
5. 崔建远:《物权效力的一般理论》,载《法学杂志》,2003(4)。
6. 郭明瑞等:《民商法原理》(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 杰弗瑞·A. 杰里、菲利普·J. 瑞尼:《高级微观经济理论》,中文版,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8. 刘保玉、李燕燕:《一物一权原则质疑——兼论关于物权性质的物权绝对原则》,载《政法论丛》,2004(3)。

9. 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0. 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上),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11. 孟勤国:《论“一物”》,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4)。

12. 屈茂辉:《关于物权客体的两个基础性问题》,载《时代法学》,2005(2)。

13. R. 科斯、A. 阿尔钦、D. 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制度学派译文集》,中文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4. 余延宏:《论国际私法中动产物权的客体范围问题》,载《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1)。

15. 王明锁:《对物权客体——物的含义与种类的新解读》,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6)。

16. 温世扬:《物权法要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17.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18.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物权法研究课题组:《制定中国物权法的基本思路》,载《法学研究》,1995(3)。

19. 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上),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20. 周林彬、李胜兰:《物权新论:——一种法与经济学分析的思路》,载《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6)。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商学院 南京 210091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京 210094)
(责任编辑:Q)

(上接第19页)使价值规律发挥客观调节经济利益分配和生产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而是仍然沿用计划经济从上而下强化行政权力的思维方式来谈论分配改革、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这使本来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被庸俗化,不能深入研究现实经济社会,提出有说服力的理论认识。

第四,一些研究者缺乏献身科学的学术追求和精神境界,欠缺潜心研究和独立思考,表现出急功近利、学风浮躁。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是要探寻客观真理。探寻真理者首先必须做“真人”,“守身为大”,做到不为名利、不图虚华、献身科学、追求真理、诚实勇敢、淡泊宁静、潜心刻苦、独立思考、长期坚守。“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⑭然而,在转型期社会崇尚功利的环境下,本应是圣洁的经济科学殿堂也被污染,甚至成为一些人沽名钓誉、捞取利益的名利场。有人为了获得个人名利,不讲为学者的独立人格和学术良心,或攀权附势,或投机取巧,或哗众取宠,或急功近利,提出一些对社会不负责任的奇谈怪论,玷污了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历史使命,由此遭致社会舆论的诟病。

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要取得更大的理论成果,必须从根本上扭转以上倾向。这需要经济学者增强献身科学的事业心、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抛弃私心杂念,夯实理论功底,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孜孜不倦的献身精神,坚持不懈地潜心研究。

注释:

⑭⑮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489、492、631~632、6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2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⑯⑰⑱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10、10.8、8.51、683、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32、32~33、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⑲⑳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3卷,716、9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㉑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㉒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90年8月27日于福克斯顿),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6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㉓恩格斯:《致威·桑巴特》(1895年3月11日于伦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742~7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㉔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于伦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6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㉕⑹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71、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单位:求是杂志社 北京 100727)
(责任编辑: S)